

村寨

族

海南五指山市福关村调查

主 编：张 跃
周大鸣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云南大学出版社





族

海南五指山市福关村调查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 编：张 跃
周大鸣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黎族：海南五指山市福关村调查/张跃，周大鸣主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高发元主编）
ISBN 7-81068-779-4

I. 黎... II. ①张...②周... III. 黎族-居住区-
调查报告-五指山县 IV. K28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923 号

黎族——海南五指山市福关村调查

主 编：张 跃 周大鸣

责任编辑：李兴和
责任校对：李 云
装帧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9.5
插 页：8
字 数：480 千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68-779-4/C·62
定 价：40.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电 话：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0871-5162823

总 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在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 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 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D.G. 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000 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 年 7 月 ~ 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投资。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 15 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 110 人，占 54%（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干部 11 人，占 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 人，占 40%。调查队伍

^① 调查由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1 本专题研究报告、1 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 1 300 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以中青年为主，其中 45 岁以下 170 人，占总人数的 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 作为云南大学建校 80 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 and 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 32 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 这次调查的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 个省区的 41 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 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31 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 1 500 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 166 页。

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 32 本，文字总量 1 000 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 13 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 30 万字；1 本调查工作实录 28 万字。此外，32 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 10 000 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 32 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004年5月

前 言

飞机在10 000米的高空中穿行，四周有些淡淡的云彩。琼州海峡似一条微微打着些褶儿的蓝色缎带静静地在大地上伏着，并向两边不断延伸，无边无际。我们正在穿越它向着中国的最南端飞行，那里有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海南岛。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黎族调查点就选点在这个秀丽的南部海岛中部的一个黎族村寨里。

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烟波浩淼的南海北部海面。充沛的阳光和丰富的雨水赋予它一片旖旎的亚热带、热带风光，而这个海岛上最早的居民——黎族则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让海南岛拥有了别具一格的风情。近100年来，国内外很多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海南的黎族，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大批学者在进行全国民族大调查时，就对海南黎族作了详尽的描述。我们对黎族村寨从经济、政治、人口、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再次进行深入调查的目的就是想走进这块美丽的土地，融入当地黎族的生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看看一个黎族的村子在近5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和现状。

黎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有124万余人，其中海南省117万多人，占黎族总人口的94.3%，分布于全岛各地。

海南岛拥有长1 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全岛的面积约34 000多平方公里。岛的四周皆是宽阔的平原，中部则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巍峨叠翠的群峰，纵横交错的水系。海南的第一高峰五指山与鹦哥岭、黎母岭和霸王岭一起构成了五指山区，成为海南岛的“心脏”，著名的通什、营根、东方、白沙、乐东等盆地就处在这重峦叠嶂之间。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在23~25摄氏度，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1 500~2 000毫米。葱郁挺拔的椰子树和槟榔树随处可见。在茂密的热带天然林海及亚热带长绿林中栖息着340多种鸟类、70多种兽类和100余种两栖爬行动物。此外，这里还生长着1 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和妖娆美丽的热带花卉。这美丽富饶的海岛便是黎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家园。

自秦代开始，海南岛就被纳入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中。秦时，海南是象郡的边塞。至汉朝，这里设儋耳、珠崖二郡。到南朝时，海南废儋耳郡，设置崖州，隶属于广州都督府。隋朝时海南岛重设珠崖郡、临振郡、儋耳郡。唐时又在岛上设5州、22县。元则在此地设置琼州路。明改称琼州府。清袭明制。民国期间在海南置琼崖道，后归广东省管辖。新中国建立后于1952年7月在此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隶属广东省，1955年改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1988年4月海南建省，成为我国第31个省份。

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是黎族。这个相传是百越后裔的民族聚居在海南岛中部和西南部的盆地河谷和滨海平原上，普遍自称“赛”。如今，根据语言（方言、土语）和文化特征，基本上把海南岛的黎族地区划分为侬方言区、杞方言区、润方言区、美孚方言区和赛方言区。

千百年来，黎族在不断接触、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黎族曾有浓厚原始色彩的共耕经济

组织——合亩制，他们通过“刀耕火种”方式种植山栏地。黎族的建筑极富特色，其状如倒扣的船篷，被称为“船形屋”，后受汉族影响，黎族人又建起了“金字型屋”。他们还有专供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对歌娱乐的“寮房”（或“隆闺”），当然还有从“寮房”里传出的音韵和谐的美妙歌声。黎族人爱唱歌，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无论是岁时节庆还是日常生活，黎族人都愿意用歌声来表达他们内心丰富的情感。黎族人爱跳舞，他们的舞蹈节奏明快、热情奔放，当年苏东坡从海南流放归来之后，就写下“蛮舞与黎歌，余音犹杳杳”这样的诗句来描述他对黎族歌舞的感受。虽然黎族没有本民族自己创制的文字，但是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留下了大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等。勤劳的黎家妇女们有着一双巧手，她们织出的黎锦色彩艳丽，图案造型稚拙夸张。宋代周去非在写到用黎族织锦制成的衣裙时称：“衣裙皆吉贝，五色灿然。”现在悬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展览正厅的6幅大型黎锦壁挂《丰收图》、《婚礼图》、《祭典图》、《福魂图》、《兵马图》、《祖宗图》更是集黎锦传统花纹图案为一体，描绘了黎族丰收、婚礼、祭典等盛大场面，生动地反映了黎族织锦的高超技艺。黎族妇女还有黥身文脸的习俗，《山海经·海内南经》就曾记载黎族先民们“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郭沫若到海南时也曾写下“花门梨面传闻有，今到保亭始见之。黎族积緇成习尚，妇容黥墨足惊奇”的诗句。尽管现在的黎家妇女已不再黥身文脸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老年妇女的脸上看到这种古老习俗留下的痕迹。黎族定居在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岛之上，自秦把海南岛纳入中央管辖范围之时起，不断有汉人迁入海南，黎汉两族的文化从此也开始交流融通。宋末元初时，松江乌泥泾的黄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加工棉花与纺织印染等工艺，并将其传入她的家乡，使得松江府的棉布衣一

时之间甲于天下。而唐宋以来一些贬官流放的士大夫谪居海南，在此期间他们兴办学堂，教授汉文化，促进了黎汉两族的友好交往，正所谓“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海南岛与外界的往来日渐密切，黎族传统文化也逐渐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央在海南省设立经济特区，一时间，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文化式样都涌入海南，对原本比较闭塞的黎族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渴求自身经济发展与保存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时，许多传统的习俗和工艺正在慢慢消失。拿今天的海南黎族与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调查资料中的海南黎族相比，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经济、政治方面，还是风俗习惯、手工技艺方面，黎族社会都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带着对绚丽多姿的黎族传统文化的满心赞叹，带着对当今黎族传统文化渐渐流失的忧虑，带着对黎族社会近 50 年来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一探究竟的心情，我们黎族调查组一行 8 人来到了海南省五指山市冲山镇福关村。在这里，我们与福关村的黎族人一起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历史沿革、经济、政治、人口、生态、教育、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去了解他们，从而描摹出这个当代黎族村寨的现状，并以此为剪影反映整个黎族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那么，在海南岛众多黎族村寨中，为何要选择五指山市冲山镇福关村作为我们本次黎族调查的调查点呢？这并不是出于偶然，我们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

第一，五指山市位于海南省五指山腹地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黎族最为密集的聚居地区。五指山市原为保亭县通什镇，自 1955 年中央在海南岛设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时起，自治州首府大部分时间就设在通什镇。1987 年改设通什市。翌年海南建省，通什市归海南省直辖。2001 年 8 月通什

市更名为五指山市。尽管五指山市因黎区行政建制的变化已不再是自治州的首府，但这里毕竟曾是黎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至今仍有 5 万余名黎族同胞生活在这里，占海南岛黎族总人口的 4.3%。五指山市所辖乡镇下面的大部分村委会里 99% 以上的人口均为纯粹的黎族。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经济往来还是婚丧嫁娶，邻近的各个黎族村寨之间都往来频繁，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基本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在此选择一个黎族村寨作为本次调查的调查点，有助于我们掌握整个五指山市以及周围地区黎族的概况，从而把这个黎族村寨的变化发展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得到更深刻的认识。再者，由于五指山市地处通什盆地内，四周群山环绕，交通不是很方便，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这里的黎族传统文化保存得也相对要好一些。

第二，从黎族内部五个方言区的分布情况来看，五指山市境内的黎族属于杞黎。杞黎又作歧黎，汉文史籍中称之为“生铁黎”或“生黎”，主要居住在五指山市、保亭和琼中。杞黎人口仅次于侏黎，在海南黎族总人口中居第二位。杞黎具有明显异于其他 4 个黎族支系的文化特征。经济上的突出表现在杞黎所在的广大五指山腹地正是黎族社会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保留着带有浓厚的原始共耕色彩的“合亩制”地区。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显示，在五指山腹地，保留“合亩制”生产方式的有 26 个乡，面积 1 000 多平方公里，共有 917 个“合亩”，人口为 13 400 多人，占当时黎族总人口 36 万的 3.37%。“合亩”是汉语的意译，黎语称“纹茂”，意即家族，有“合伙共耕田地”的意思。从历史来看，“合亩”可能是黎族古代家族公社在逐渐瓦解的过程中形成的生产资料从家族公有到个体私有的一种过渡形式。“合亩”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由同血缘或以同血缘为核心的若干农户组成一个生产单位，私有或伙有的

主要生产资料，比如耕地和牲畜，无偿交给“合亩”统一经营和使用，集体劳动产品基本按户平均分配，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合亩制”地区深入五指山中心地区，那里山高林密，溪涧纵横，交通闭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生产力水平比黎族一般地区低。尽管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地区已逐渐废除了“合亩制”，但是作为曾经在黎族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活关系，对该地区黎族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等等，都值得我们用心去研究。服饰上，杞黎男子额前结小髻，并用丈许长的红布或黑布缠头，上身穿黄麻织就的对胸无纽上衣，下穿前后挂一幅布的“吊铲裙”。妇女头戴头巾，头巾上有绣花，上衣虽有银牌样的纽扣，但只作装饰用，在衣边或后幅下端，衣袖处均绣有红色花纹或者镶嵌白色布条。除了上衣外，还有一块遮胸布。下身穿筒裙，这里的筒裙最多长及膝盖，上面主要用红色的丝线织成各种动植物图案或者人形图案。妇女们的脖子上还会带着银白色金属项圈或者用玻璃珠制成的项圈。由于地域及服饰上的一些差别，杞黎内部又可分为“大髻”、“小髻”、“生铁”、“吊铲”等几个小的分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杞黎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我们调查选择的调查点冲山镇福关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杞黎村寨。尽管和居住在海南其他地方的黎族一样，福关黎族在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日趋汉化，但是相对而言，福关还是保存了相当多的杞黎传统文化特征。

第三，福关村坐落在五指山市西北部的一片南北走向的低缓丘陵上，所占面积大约为 1.4 平方公里。据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统计，福关村共有 222 户，总人口数为 1 003 人，其中 99% 以上的人口为黎族。从语言服饰等方面的差异来看，福关的黎族属于杞黎中的“大髻”小支。由于福关村委会是个非常大的村委会，整个福关村委会的人数过多，我们无

法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调查，所以我们又选择了福关村委会驻地的福关自然村作为调查的重点。福关自然村包括 4 个村民小组，分别是福关一村民小组、福关二村民小组、毛利村民小组和红路村民小组，总户数为 171 户，人口总计有 706 人，规模适中。而且这 4 个村民小组居住得非常集中，从客观上为我们按时完成调查任务提供了方便。

第四，从地理位置来讲，福关村距五指山市区仅 2.5 公里，在它的周围还有很多黎族村寨，村与村之间基本都有土路相通。除此之外，村中还有两条简易公路，一条是 1964 年 8 月建成的番（茅）—毛（道）简易砂石公路，另一条是 1976 年 2 月建成的福（关）—毛（松）简易等级外砂石路。通过这两条公路，福关村不仅与周边的黎族村寨来往更加紧密，而且与五指山市区乃至相隔较远的毛道乡有了更加频繁的往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关村与周围的这些黎族村寨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对福关村一个村寨的调查来掌握五指山地区杞黎发展的概况。

第五，从经济发展来看，福关村地处原黎族“合亩制”地区的中心地带。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生产力非常低，村民们主要种植山栏稻和单造水稻，并辅以狩猎、捕鱼、采集等生产方式。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农村社会制度改革的发展，在福关村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合亩制”已经瓦解，但是受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福关的经济发展虽然比某些深处大山里的黎族村寨要好，但是与周边的福利、红雅、什保、番茅等黎族村寨相比，还是要落后一些。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在黎族社会中相对适中的村寨来调查是比较合适的。

第六，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全国少数民族进行大调查中，当时的黎族调查组也选择了福关村（当时称之为福关表）作为其中的一个调查点，从人口情况、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几个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描述了福关黎族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时的社会风貌。这为我们今天再次选择福关为黎族调查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有利于我们作一个比较，看看在近 50 年的时间里，这个黎族村寨发生了哪些变化。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的黎族调查组共有 8 人，由来自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和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的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组成，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2 人，讲师 1 人，博士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2 人，四年级本科生 2 人，组长由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张跃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担任。调查组成员年龄最大的 45 岁，最小的仅 20 岁，平均年龄为 30.9 岁。调查组的学科背景包括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等。

我们的整个调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03 年 7 月 15 日前）为准备阶段。在还未去海南岛之前，调查组的成员就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搜集整理有关海南黎族的研究资料，从而对黎族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状况在头脑中有了清晰的轮廓。在熟悉资料的同时，我们还积极与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取得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做好选点工作。

第二阶段（2003 年 7 月 16 日～8 月 20 日）为实地调查阶段。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2003 年 7 月 16 日，黎族调查组中来自云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调查人员在海口会合，第二天即一同乘车前往五指山市。五指山市民宗局、冲山镇政府对我们的工作都非常支持，在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们便在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相关领导的带领下参观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了解当地文化部门对黎族传统文化实物的搜集、整理和保护情况，并查阅了博物馆和民族研究所里现有的介绍五指山区杞黎的文字资料